

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

——第一届中瑞考古学论坛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考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EAST ASIAN LIBRARY

1100 EAST 58TH STREET
CHICAGO, ILL. 60637

1980

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

——第一届中瑞考古学论坛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考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ARCHAEOLOGY IN CHINA AND SWEDEN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First Sino-Sweden Archaeology Forum

Compiled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Swedish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Science Press
Beijing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国瑞典两国学者在对“中国—瑞典考古学论坛”上的学术报告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后编辑的学术文集。所收 18 篇论文涉及中瑞双方当前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和当今考古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内容涉及城市考古、文明起源、冶金考古、史前考古、聚落考古、动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地磁探测、GIS 系统的应用、基建考古、数字考古、文物保护等考古技术和方法的诸多领域。

本书可供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和文物、博物馆部门的研究人员、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以及考古、文物爱好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第一届中瑞考古学论坛文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ISBN 7-03-018316-9

I. 中… II. ①中…②瑞… III. ①考古学—中国—文集②考古学—瑞典—文集 IV. K87-53 K885.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4226 号

特约编辑：冯浩璋 / 责任编辑：宋小军 王刃余

责任印制：安春生 / 封面设计：陈 敬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3 1/4 插页：12

印数：1—1 600 字数：329 000

定价：1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序 一

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为了推进中国和瑞典考古学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中瑞两国在考古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和瑞典两国国家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考古研究所,于2005年9月26~27日,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中国—瑞典考古学论坛(Sino-Sweden Archaeology Forum)”。

众所周知,瑞典在近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起源于北欧的丹麦考古学“三期说”,首先在瑞典得以承认;瑞典著名考古学家尼尔森与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沃尔赛共同成为世界级的史前考古学奠基人;蒙特柳斯的“年代类型学”则享誉世界考古学界,他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滕固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又,上海世界书局以《考古学研究法》为名,于1936年出版该书,由郑师许、胡肇春翻译)是较早被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考古学界的,这本考古学著作曾经对几代中国考古学家产生重要影响。

瑞典学者在包括中国考古学在内的广义“汉学”研究方面,在近代欧美学术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尤以著名学者斯文·赫定、安特生和高本汉学术贡献突出,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巨大而深远。世界级百科全书式学者、大探险家斯文·赫定曾4次考察中国,他把“丝绸之路”展示于世界,至于楼兰遗址的发现、西藏科学考察的肇始及中外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这些都使斯文·赫定的名字凸现于中国学术史、中国考古学史之上;安特生作为发现世界闻名的“北京人”的嚆矢,仰韶文化及西北地区齐家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辛店文化和沙井文化的发现者,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占有重要学术地位;高本汉不仅在汉语言、中国古籍研究方面享誉世界汉学界,而且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方面出其右者的同时期外国考古学家几乎寥寥无几。正是由于这样一批学术大家的学术传统背景,使汉学成为当今瑞典的一门显学。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瑞典有四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还有不少专科学校、中学也设置了中文课程,这些无不说明瑞典人民对中国文化、文明与历史的热爱。我们与瑞典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合作举办的考古论坛,也是基于上述新时代、新情况,为促进中瑞两国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合作与发展,而在新世纪所做的新努力!

在“中国—瑞典考古学论坛”上,中瑞两国的考古学家就当前双方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和当今考古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瑞典专家分别介绍了

合同考古、冶金考古、田野考古资料的数字化、城镇和中心地区考古、瑞典西部海岸线考古、动植物驯化和最初的新石器时代概念、重建古代民居的日常生活、瑞典史前史、瑞典文物保护等。中国学者分别介绍了当前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的新进展和新思考、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些问题、中国古代冶金术起源的考察、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聚落考古、早期国家的石器工业、中国家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植物考古学的新发现、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人骨研究、磁法勘探在田野考古中的应用和基于 GIS 的区域考古研究等。

我们现在将中瑞两国学者的上述演讲结集出版，我想这必将使更多的中国和瑞典学者，了解中瑞两国近年考古学的最新发展与最新成果；必将为进一步增进中瑞两国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的学术了解与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必将为促进中瑞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而争光添辉！

序 二

本特·K. Å. 约翰松
(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主席)

瑞中两国的联系有悠久的历史。18 世纪时, 装备齐全的大型船只远渡重洋驶往中国, 去运回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奢侈品。这些由开往东印度航线的帆船运回的货物, 是贵族和殷实资本家企求的东西。那时人们对中国怀着奇异而朦胧的想象。在格罗特宁霍尔姆, 古斯塔夫三世的皇太后修建了整整一座中式房屋来摆放来自远东的物件。中国文化给遥远的北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 难怪中国一直以其迷人的魅力吸引着旅行家和考察家。在瑞典, 这些考察家中最著名的恐怕是斯文·赫定。但是在中国人看来, 这样的大考察家大研究家当是约翰·贡纳尔·安特生。

J. G. 安特生是以地质学家的身份来到中国的, 但他在工作中发现了过去无从得知的几个阶段的早期中国史。这不仅对中国考古学而且对中国人关于其文化起源的看法, 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2005 年 9 月 26 ~ 27 日北京的中瑞考古学论坛应该说就是以此为背景召开的。约翰·贡纳尔·安特生在中国考古学中依然占有突出的地位。中国方面对瑞中考古学的交流极感兴趣; 而瑞典方面, 由于不言自明的缘故, 同样热衷于与中国的交流。西安陶俑就是那广袤地域内一桩桩令人兴奋的发现和发掘的一例。

考古学向来是国际的学科。国际交流对技术课题和发掘资料之比较研究的意义正与日俱增。中瑞考古学论坛的安排反映了这些研究门类。这次讨论会使我们得以在先前看来似乎大相径庭的时代和文化之间作出令人入迷的比较。瑞方的与会者还同中方东道主一道, 有机会在河南省盘桓数日, 考察了 J. G. 安特生当年发掘的最重要的遗址, 又饶有兴味地参观了其他几处考古遗址和博物馆。

这次论坛恰逢紫禁城里一项大展开幕, 展品是瑞典出土的中国瓷器, 主要是哥德堡号的出土物。展览揭开了以 2005 ~ 2006 年东印度帆船哥德堡号从哥德堡驶往香港和上海的航行为肇始的一系列活动的序幕。有几个陈列柜展示了借自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现今藏品中 J. G. 安特生在河南发掘的器物。瑞中两国在贸易和考古方面的今昔联系, 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的。

目 录

序一	刘庆柱 (i)
序二	本特·K. Å. 约翰松 (iii)
当前中国古代早期都城(或都邑)考古的新进展与新思考	刘庆柱 (1)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 巍 (18)
中国古代冶金术起源的考古学观察——以铜和铁为中心	白云翔 (30)
从灰嘴发掘看中国早期国家的石器工业	陈星灿 (51)
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聚落考古学研究	许 宏 (62)
论中国古代家猪和家马的起源	袁 靖 (90)
小米起源的研究——植物考古学新资料和生态学分析	赵志军 (98)
基于 GIS 技术的聚落考古研究	刘建国 (105)
地磁探测与考古发现	钟 健 (115)
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居室葬的人骨调查	张 君 巴巴拉·李·史密斯 (127)
瑞典史前史概述	安德斯·卡利夫 (139)
最初的新石器时代概念	芒努斯·安德松 (146)
重建古代居民的日常生活	卡罗琳·阿西尼 (166)
公元初至 1700 年瑞典城市化概述	拉尔斯·埃斯戈德 (175)
冶金考古——考古资料和分析结果的透视	莱纳·格朗丹 (184)
从区域到地方——瑞典考古的孢粉分析	佩尔·拉格罗斯 (192)
田野数字建档	卡琳·伦德 (201)
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的合同考古简介	拉尔斯·埃斯戈德 (211)
附录	
开辟中瑞考古交流与合作的新篇章——“中国—瑞典考古学论坛”纪要	
.....	《考古》编辑部 (215)
后记	白云翔 (221)

Contents

Preface I	Liu Qingzhu (i)
Preface II	Bengt K. Å. Johansson (iii)
New Advances and Ideas of Curr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to Early Capitals of Ancient China	Liu Qingzhu (1)
Some Problems on Study into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ang Wei (18)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Ancient Chinese Metallurgy with Copper and Iron in the Focus	Bai Yunxiang (30)
Lithic Production of Early States in China –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raft Specialization	Chen Xingcan (51)
The Settlem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the Erlitou Site and the Peripheral Region	Xu Hong (62)
On the Origins of Domesticated Pigs and Horses in Ancient China	Yuan Jing (90)
Domestication of Millet – Paleoethnobotanic Data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	Zhao Zhijun (98)
GIS-based Research of Settlement Archaeology in China	Liu Jianguo (105)
Geomagnetic Survey and Discoveries in Archaeology	Zhong Jian (115)
Human remains from Xinglongwa In-house Burials, Aohanqi District of Chifeng City, Inner Mongolia	Zhang Jun Barbara Li Smith (127)
Scenes from the Prehistory of Sweden – a Brief Overview	Anders Kaliff (139)
The First Neolithic Concept	Magnus Andersson (146)
Reconstructing Daily Life in Past Populations	Caroline Arcini (166)
Urbanization in Sweden 0 – 1700 AD – An Overview	Lars Ersgård (175)
Archaeometallurgy – Archaeological and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Lena Grandin (184)
From Regional to Local; Pollen Analysis in Swedish Archaeology	Per Lagerås (192)
Digital Field Documentation	Karin Lund (201)
Contract Archaeology at the Swedish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A Brief Presentation	Lars Ersgård (211)

Appendix

Open a New Chapter of Sino-Swedish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f Archaeology: A Summary of the “Sino-Sweden Archaeology Forum”

..... *Archaeology*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215)

Postscript Bai Yunxiang (221)

当前中国古代早期都城（或都邑）考古的新进展与新思考

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古代都城考古是考古学的重要内容，尤其在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中，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又占有特殊重要地位。这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发展史，古代都城又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制活动中心，古代都城是古代王朝的历史缩影。在近年的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中，中国古代早期都城（或都邑）考古成为学术研究的难点、热点与重点。之所以说中国古代早期都城考古是“难点”，我认为这是由于古代早期都城考古相对晚期都城考古而言，可参考的历史文献更少，作为考古对象的遗迹、遗物更少，田野考古对象的保存状况更差，勘探与发掘的技术难度更大。至于近年早期都城考古成为热点与重点，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与重点内容，而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时空特点决定，田野考古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力量，而田野考古研究中又以早期都城考古在古代文明形成研究中发挥着中坚作用，早期都城研究成为古代文明形成研究的重点与切入点。中国古代早期都城考古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的这种关系，又使其成为学术界倍加重视的研究领域。

一、二里头遗址以前早期都城或都邑的探索与考古发现

中国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也有的学者将其形象地说成“中国第一王都”^[1]。但是，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的¹⁴C测年数据表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1750~前1520年^[2]。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的夏代纪年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3]，从时代上看，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遗址的¹⁴C年代属于夏代中晚期至商代早期。如果目前所说的二里头遗址为中国早期都城遗址之一的話，那么它应属于夏代中晚期的夏王朝都城遗址，也就是从理论上讲，还应该有时代比作为“中国第一王都”的二里头遗址更早的都城遗址，即二里头遗址以前的夏王朝都城遗址。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田野考古发现资料与¹⁴C测年来看，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国，夏王朝的早期实际上已处于龙山时代晚期^[4]。传统所说的龙山时代出现了“万邦”、“万国”局面，这时虽然还没有王国时代的都城，但是出现了作为政治

管理中心的“城”或“都邑”，近年考古学家在探讨早期都城时，对它们（早期都邑）也进行了探索与研究。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早于二里头遗址的都邑或都城遗址的重要考古新发现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城址和半圆形特殊建筑遗迹、小城遗址之内的大型建筑遗址及其与城址相关的墓地发现；河南王城岗大城遗址的勘查，新砦城址的发现与大型浅穴式建筑遗存的全面揭露等。

20世纪70~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襄汾发现并发掘了规模庞大的陶寺文化墓地^[5]。20世纪90年代末，重新启动了陶寺遗址的考古工作，其主要学术目的与任务就是寻找与陶寺文化墓地相应的陶寺文化城址。经过考古调查、勘探、试掘和发掘，取得了学术突破，发现了陶寺城址，近年来的不断工作，进一步究明了陶寺遗址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城与中期小城遗址（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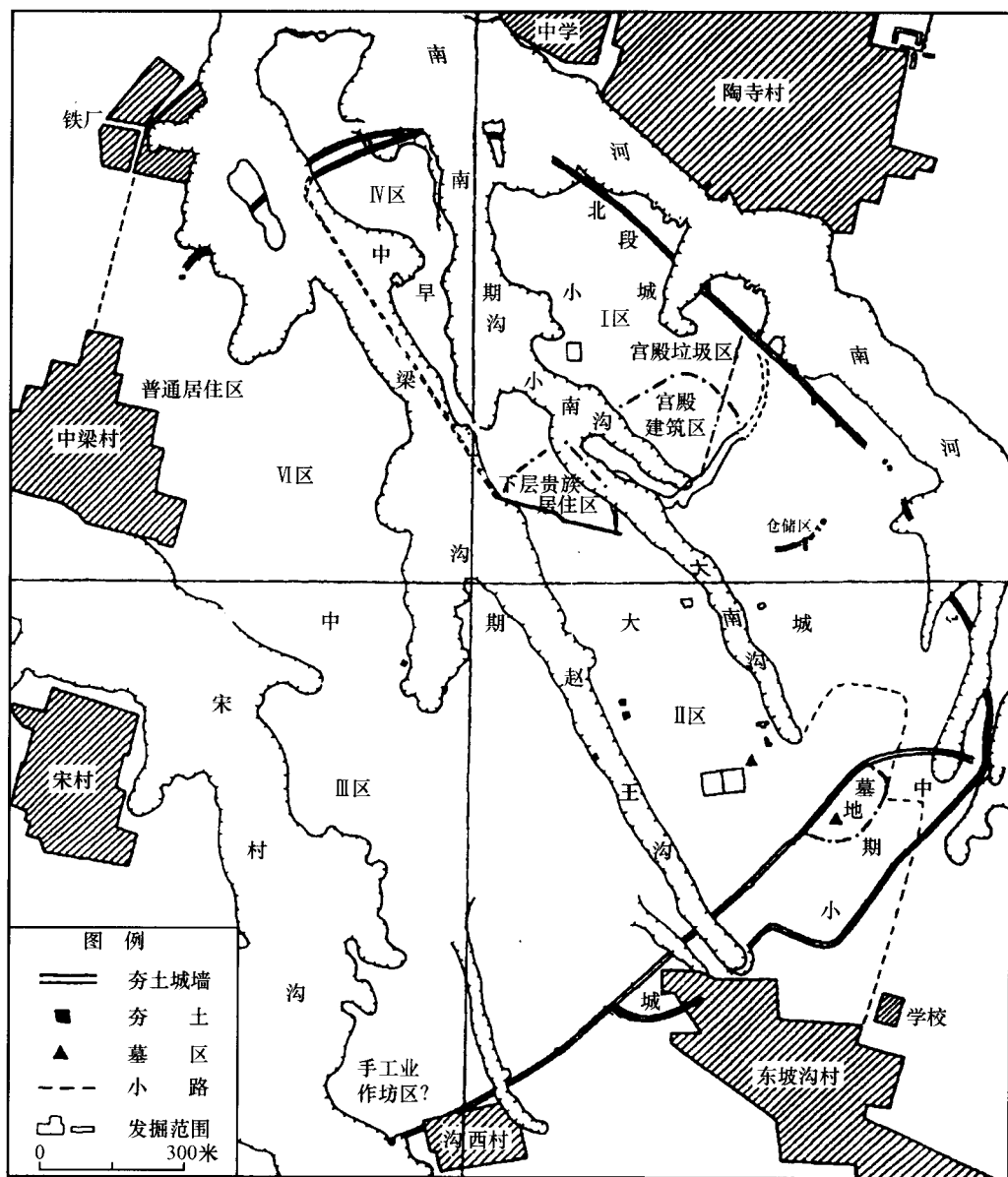
早期小城遗址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面积56万平方米。小城分为东西二区，东区为宫殿区，西区为下层贵族区。20世纪70~80年代发掘的陶寺文化早期大墓及其墓地应为早期小城的墓葬区。

东区位于小城东南部，面积6.7万平方米。核心建筑区主要分布在东区西半部，即早期小城的中南部，面积约5万平方米。宫殿区的大型夯土建筑，可能使用到小城城邑废弃以后的中期，也就是说有可能这些大型夯土建筑在中期大城的时候作为宫殿建筑继续使用。东区东半部有相对集中的灰坑，似为宫殿区的生活垃圾所在地，占地面积1.7万平方米。

西区位于小城南缘，面积约1.6万平方米，已勘探发现多座夯土建筑基址，但其形制简单，建筑基址平面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建筑相对分布密集，房址周围多有垃圾灰坑。但是房屋的夯筑基址、原来房子的白灰面，以及结合其附近同时期墓地墓主人的埋葬情况，可能西区是当时下层贵族的居住区。

早期小城的考古发现说明，东区是其主要建筑，这些建筑属于大型夯土的宫殿建筑遗址。西区虽然属于下层贵族居住区，但是这些“下层贵族”应该是直接服务于宫殿区主人的人员。在东区东南部有仓储区，作为小城的粮库。根据小城之中的文化内涵来看，小城实际上是其附近所管辖地域的社会“管理中心”，这一地域可能已经是不同血缘的多个聚落或聚落群的“共同管理”中心。

中期大城基本是在早期小城基础之上，向南、西、西南面扩展而成。大城东南部附连小城。大城平面为圆角长方形，总面积280万平方米，其中小城面积10万平方米。早期小城的宫殿区继续为中期大城所使用。中期小城的西北部是一处同时期的大贵族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小城墓地以南为一祭祀区，其中发掘了一处可能具有“观天授时”与祭祀双重功能的建筑遗址。在大城东南部相对独立的仓储区，其范围长约100米、宽约10米。粮仓平面形制以竖穴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为主，大者边长约10米，小者边长约5米，竖穴深4~5米。仓储区中的大型粮仓属于陶寺文化早期与中期的，也就是说这一仓储区既为早期小城所使用，又为中期大城所沿用。中期大城从城之规模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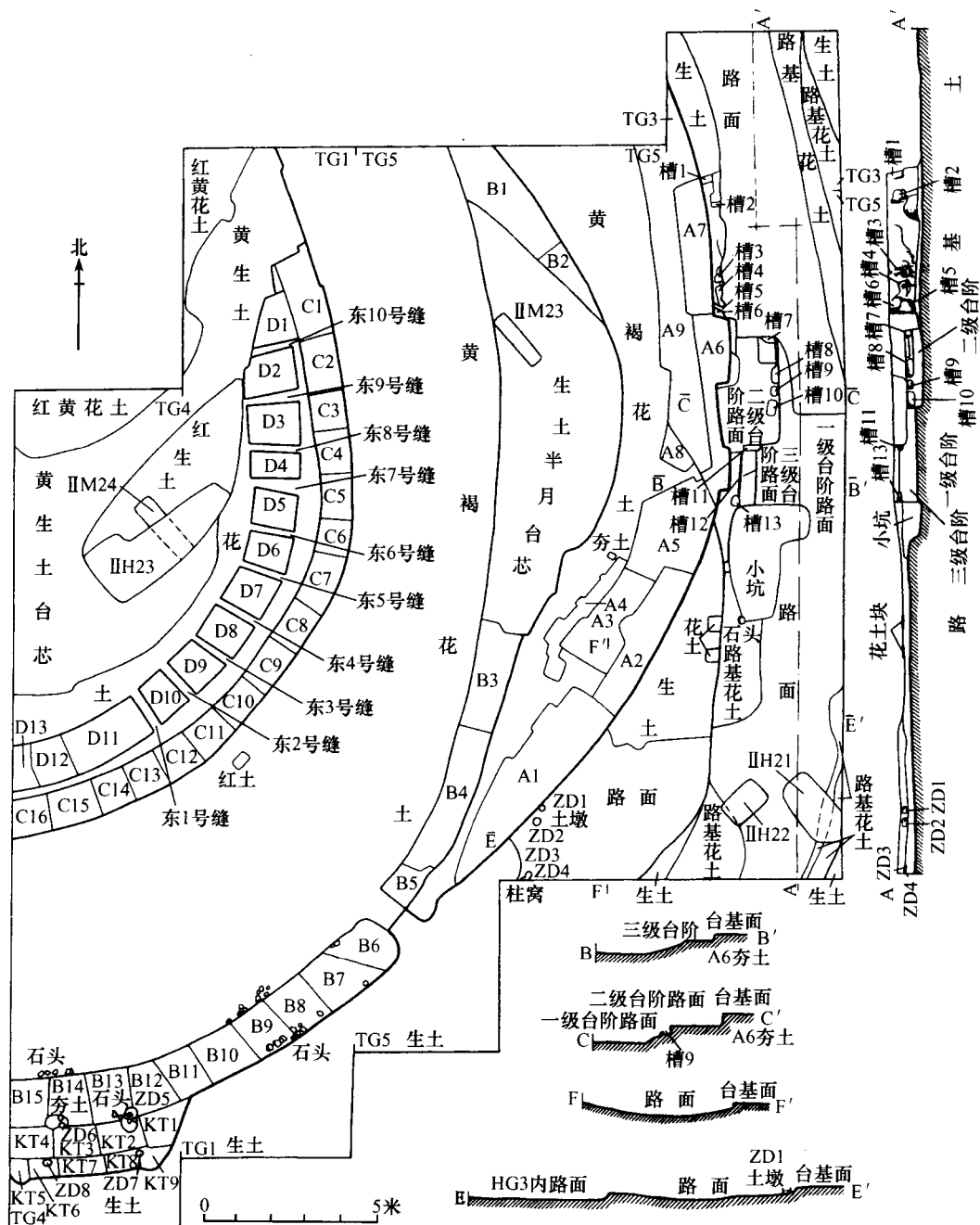


图一 陶寺城址平面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2002 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 5 期，第 43 页，2003 年 1 月）

看，大大超过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之中的小城，现在考古发现的有大贵族墓地和“观天授时”的“礼制建筑”遗址。这是早期小城所没有的。这些说明，中期大城比早期小城结构更为复杂，大贵族的墓地，离城更近了，甚至就安排在大城的小城之中。“观天授时”建筑的发现，说明大城宫殿区的主人，已经利用“天文”为其所管辖的众多

聚落或聚落群“服务”，这种“服务”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服务于农业生产；后者表现为服务于宫殿主人对其管辖范围的“精神统治”（图二）。



图二 陶寺遗址“观天授时”建筑遗址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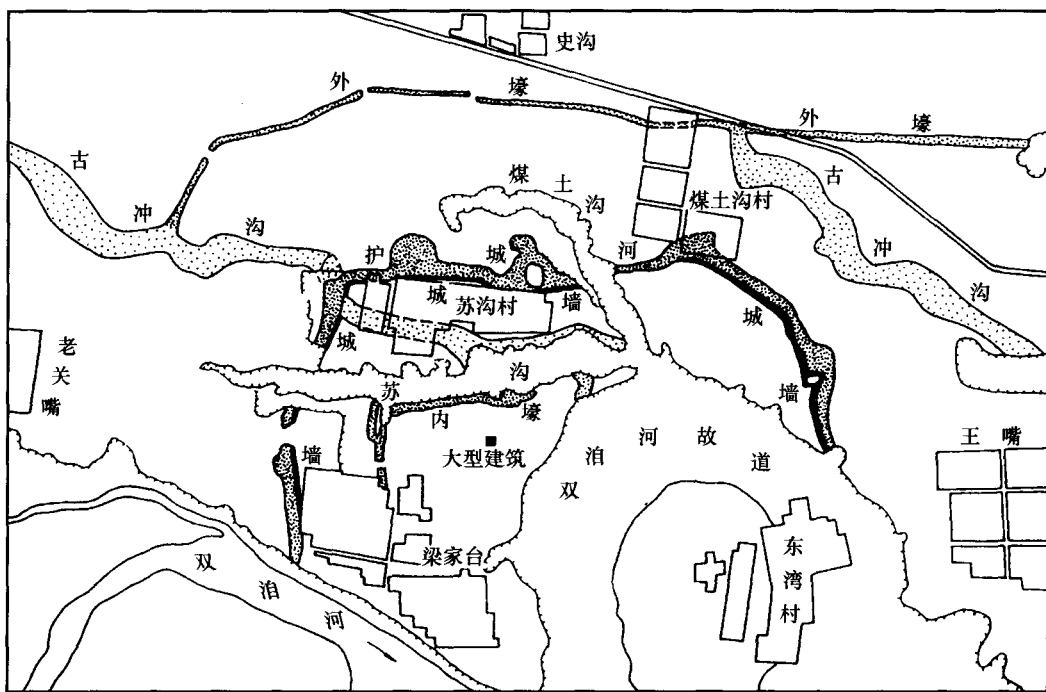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地下建筑基址 2003 年发掘简报》，

《考古》2004 年 7 期，第 12 页）

陶寺城址成为至今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的唯一一座由大城与小城组成的、又在城中发现了宫殿区建筑基址及其仓储区和具有“观天授时”功能建筑遗迹的城址。不仅如此，城郊还发现了与城址同时期的大型贵族墓葬与墓地^[6]。陶寺城址的另一重要学术意义是，其地望与历史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尧都“平阳”是一致的^[7]。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发现了告成遗址，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重点调查与钻探^[8]，1977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对该遗址的王城岗城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9]。王城岗城址包括东西并列相连的二城。其中东城大多已被河水冲毁，城址仅存西南角的一小部分；西城保存较好，城内面积约1万平方米。王城岗城址¹⁴C测年为公元前2050~前1910年（未经树轮校正）^[10]，其年代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代早期。根据城址所在位置，属于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11]。东周时代的“阳城”遗址已经考古发现，王城岗城址与东周“阳城”遗址隔河东西相邻。但是，学术界一般认为，相对其他同时期的城址，王城岗城址作为“禹”都，似乎规模小一些^[12]。可喜的是，2002~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王城岗遗址又开展了新的大规模考古工作，新究明的遗址范围是：东自五渡河西岸，西到八方村之南；北由王岭尖南边，南至颖河北岸。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其间，又新发现了一座“大城”，面积约30万平方米。这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中最大的古城址之一。大城的时代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大城之中有大面积的夯土基址、祭祀坑等遗迹，还出土了玉石琮、白陶器等高等级遗物，大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了^[13]。王城岗遗址的大城与过去发现的王城岗城址的小城属于同时期的建筑，并且小城是大城的一部分，小城位于大城之东。有的学者认为，小城是宗庙建筑区所在地，大城是国家的行政中心。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王城岗遗址的大城和小城，就是人们一直在寻找的、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即夏代初年的都城^[14]。新的年代学研究成果认为，与二里头遗址年代相连接、又具有“都邑”规模和规格的城址是新密新砦遗址。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年代为公元前1750~前1520年^[15]。新砦遗址的新砦期最近测定的年代绝大部分在公元前1830~前1680年之间，主持新砦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赵春青估计，新砦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850~前1750年，其下限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公元前1750~前1700年，二者年代前后衔接。这一测年结果，反映出新砦期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下连接的顺序^[16]。2002~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的新砦遗址，确认了遗址是一座设有外围壕沟、城壕和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的大型城址。城址平面近方形，南以双洎河为天然屏障，东、北、西三面夯筑城墙，城墙为龙山文化时期所筑，新砦期城墙建于废弃后的龙山文化城墙之上。城内面积70万平方米。外壕位于新砦期城址北城墙以北约220米处，东西长1500米、南北宽6~14米、深3~4米。若加上外壕与北城墙之间的面积，新砦期城址总面积约为100万平方米。新砦期城址中心区的东、西、北三面置壕沟，即“内壕”，其中面积约在6万平方米左右，有的学者将其视为新砦期城址的“内城”（图三）。在中心区中央偏北有一大型浅穴式建筑遗址，经

2003~2005年的连续考古发掘,现在已基本究明这是一处新砦期晚段多次使用的大型浅穴式露天活动场所,东西长92.6米、南北宽14.5米,面积约1000多平方米。发掘者根据大型浅穴式建筑遗址的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认为这可能是文献中所说的“坎”、“堦”之类的祭祀遗迹^[17]。有的学者根据相关古籍记载,提出新砦城址可能是夏启之居^[18]。我认为文献记载,夏启是夏王朝建立之初的国王,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代纪年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19]。前已述及,新砦城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850~前1750年,也就是说这里不可能为夏启之都城。当前关于新砦城址的学术问题,主要不是夏代哪个国王定都于此,而是新砦遗址是不是夏代的都城遗址。我认为根据目前考古资料,现在还不便作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田野考古工作,在关键性的田野考古资料方面要有所突破,这样才能使相应的考古学研究更为深入。



图三 新砦城址平面示意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砦队等:《新密市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8期,第56页,2004年8月)

二、“三代”都城遗址的近年考古新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近年来对二里头遗址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现在考古工作者根据其新的田野考古资料,提出二里头遗址范